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城市规划与建设史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主办

主编辑读

特约专稿

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方向
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张 兵
张 松

学术文章

乐山古城历代水患与防洪措施研究
当代中国都市主义：1978～2008
中国古代城市智慧与环境时代的城市策略
1949年以来北京服务经济与城市空间转型
广州城市对外商贸用地迁移初探——从唐代蕃坊到清末沙面
广州变形记：从晚清省城到民国第一座现代城市
宇文恺：划时代的营造巨匠
“立体土地”——中国城市推广长寿命住宅的政策模式探讨

吴庆洲
张 杰
董 卫
顾朝林 贺 鼎 袁晓辉
吴晓松 罗海文
冯 江
王树声
高晓路

国际快线

欧洲城市规划的历史：延续与变迁

劳拉·科尔比

经典集萃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若干问题
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
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

董鉴泓
G.阿尔伯斯
凯瑟琳·库克

第6卷 第1期 (总第15期)

2013



商务印书馆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本期执行主编 张 兵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第6卷第1期, 总第15期)/张兵 本期执行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115-8

I. ①城… II. ①顾… ②张… III. ①城市规划-研究-丛刊②区域规划-研究-丛刊 IV. ①TU984-55②TU9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999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本期执行主编 张 兵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115-8

2013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¼

定价: 42.00 元

主编导读

Editorial

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和城市规划变革，古今中外的城市规划和发展能给当今的城市规划以怎样的启示？本期聚焦“城市规划与建设史”研究，包括“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史”与“西方城市规划与建设史”两大方面。

“特约专稿”张兵的“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方向”，认为现阶段我国规划史研究应当对规划史的研究目的以及对规划理论发展的作用做出认真的研究和定位，对规划史的研究方法也需要自觉地进行思考和改进，使规划史研究更有效地助推我国规划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张松的“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对近代城市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历程进行回溯与梳理，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阐述了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学术文章中，吴庆洲的“乐山古城历代水患与防洪措施研究”以乐山古城历代水患与其防洪措施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古人与洪水灾害斗争的智慧；张杰的“当代中国都市主义：1978~2008”尝试对改革开放后30年间重塑中国城市景观的驱动力和结果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为我们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盛行的巴黎美院学派传统在新的城市景观中的角色该如何被重新定义等议题；董卫的“中国古代城市智慧与环境时代的城市策略——从《吴越春秋》故事中得到的启发”尝试从中国古代智慧中汲取相关营养；顾朝林等“1949年以来北京服务经济与城市空间转型”运用北京市1949~2010年的产业数据和空间数据，分析服务经济作为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内在机制和空间演化趋势，为我们认识城市规划和建设史提供了“经济视角”的解读；吴晓松和罗海文的“广州城市对外商贸用地迁移初探——从唐代蕃坊到清末沙面”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影响广州城与对外贸易用地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王树声的“宇文恺：划时代的营造巨匠”梳理隋代营造巨匠宇文恺的生平，分析他所规划设计的典型作品，总结宇文恺的规划设计思想，并发掘其对中国本土规划的影响与启示。

关于西方城市规划与建设史，在“国际快线”栏目选择了劳拉·科尔比的“欧洲城市规划的历史：延续与变迁”，文章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城市、首都城

市规划、近代工业化城市、现代城市建设等方面，梳理了欧洲城市规划的演进，并重点讨论了当代“旧城保护运动”和“全球化、城市复兴和规划的可持续性”等议题。

本期“经典集萃”有董鉴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若干问题”，为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而60年后的今天反观历史，许多论点仍然可以激发我们冷静的思考；G. 阿尔伯斯的“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概述了欧洲、特别是德国从古代到1970年代之间，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了现代城市规划形成与发展以及面对社会变迁而认识觉醒的全过程，文章指出，城市规划历史不仅要研究专业技术的进步，还要研究规划目标和价值标准的发展，洞察“今天的城市规划目标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理想的城市环境的具体模型设想将向何处发展”；凯瑟琳·库克的“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是对1930年代苏联城乡规划建设的重要研究成果，反映了苏联规划界和国家政府对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本质问题的认识深度，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城镇化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研究生论坛”中有袁琳“中国传统城市山水秩序构建的历史经验——以古代成都城为例”提出中国传统山水城市非山、水、城三要素的简单并置，而是以城市山水秩序的构建为第一要义；吴淞楠“古代北京胡同管理研究”一文为我们提出了古代北京胡同管理的话题。本期“书评”“评《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和“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简史》”，都与中外城市规划建设史有关，请观其详。

近期本刊将推出“大学与城市文化创新”、“新型城乡规划”等专题，欢迎读者继续予以关注。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目次 [第6卷第1期(总第15期)2013]

主编导读

特约专稿

- 1 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方向 张 兵
13 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张 松

学术文章

- 23 乐山古城历代水患与防洪措施研究 吴庆洲
40 当代中国都市主义:1978~2008 张 杰
66 中国古代城市智慧与环境时代的城市策略——从《吴越春秋》故事中得到的启发 董 卫
71 1949年以来北京服务经济与城市空间转型 顾朝林 贺 鼎 袁晓辉
96 广州城市对外商贸用地迁移初探——从唐代蕃坊到清末沙面 吴晓松 罗海文
107 广州变形记:从晚清省城到民国第一座现代城市 冯 江
129 宇文恺:划时代的营造巨匠 王树声
144 “立体土地”——中国城市推广长寿命住宅的政策模式探讨 高晓路

国际快线

- 152 欧洲城市规划的历史:延续与变迁 劳拉·科尔比

经典集萃

- 184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若干问题 董鉴泓
194 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 G.阿尔伯斯
213 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 凯瑟琳·库克

研究生论坛

- 241 中国传统城市山水秩序构建的历史经验——以古代成都城为例 袁 琳
257 古代北京胡同管理研究 吴淞楠
274 低碳新思维——浅谈湿地系统保护恢复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李孟颖

书 评

- 288 评《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 干 靓
292 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简史》 朱 金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CONTENTS [Vol. 6, No. 1, Series No. 15, 2013]

Editorial

Feature Articles

- | | | |
|----|---|------------|
| 1 |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History in China | ZHANG Bing |
| 13 |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tudy on Modern City Planning History | ZHANG Song |

Papers

- | | | |
|-----|---|-----------------------------------|
| 23 | Study on Historical Flood Disasters and Flood Control Measures of Ancient Leshan City | WU Qingzhou |
| 40 | Urb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78—2008 | ZHANG Jie |
| 66 | Ancient Chinese Urban Wisdom and Urban Strategy in the Environmental Era: Inspiration from the Stories of <i>Wu Yue Chun Qiu</i> | DONG Wei |
| 71 |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under the Service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 GU Chaolin, HE Ding, YUAN Xiaohui |
| 96 | Exploration on Transfer of Foreign Trade Area in Guangzhou: From Fanfang to Shamian | WU Xiaosong, LUO Haiwen |
| 107 | Transformation of Guangzhou: From a Provincial Capit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First Modern C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FENG Jiang |
| 129 | Yuwen Kai: An Epoch-making Oriental Architectural Master | WANG Shusheng |
| 144 | "Multi-storey Land": A New Policy Pattern for Promoting Long-life Housing in Chinese Cities | GAO Xiaolu |

Global Perspectives

- | | | |
|-----|---|-------------|
| 152 | History of European City Planning: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 Laura KOLBE |
|-----|---|-------------|

Classics

- | | | |
|-----|---|-----------------|
| 184 | Several Issues about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 DONG Jianhong |
| 194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 G. ALBERS |
| 213 | Cities of Socialism: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20s | Catherine COOKE |

Students' Forum

- | | | |
|-----|--|-------------|
| 241 | The Order of Traditional Urban Landscape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Ancient Chengdu | YUAN Lin |
| 257 | Study on the Governance of Hutong in Ancient Beijing | WU Songnan |
| 274 | A New Thought of Low-Carbon Strategy: The Importance of Wetland System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Responding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 LI Mengying |

Book Reviews

- | | | |
|-----|--|----------|
| 288 | Review of <i>The Magic Square-Cities in Ancient China</i> | GAN Jing |
| 292 | Review of <i>A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the Western World</i> | ZHU Jin |

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方向

张 兵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History in China

ZHANG Bing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China's urban planning history is mostly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tudy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urban construction history.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research team, the research on urban planning history has also achieved some accomplishments.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tudies on planning history, we should notice that besides studies on ancient planning history, China's urban planning research mostly concentrates on th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summary of planning practices in the long term of modern times. Thus the study on the implications embedded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such as the subject of planning practice, planning process, and its effectiveness, etc. This paper addresses that at current stage, Chinese researchers on urban planning history should make their effort in the researches oriented to the study targets of planning history, as well as the roles of planning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methods

摘 要 我国规划史研究大致是在建筑史和城市建设史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规划史研究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但是如果比较国际规划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意识到,近来我国规划史研究除了古代规划史研究外,较多集中在近现代城市大时间跨度的规划实践历史分期和特点总结,对文献背后规划实践主体、规划过程、规划实效的历史研究还可以多加重视。文章认为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史研究者应当对规划史的研究目的和对规划理论发展的作用做出认真的研究和定位,对城市规划史的研究方法也需要自觉地进行思考和改进,使城市规划史研究更有效地助推我国规划理论和实践的进步。

关键词 规划史;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理论;实践

历史乃“述往以为来者师也”^①。在科学地记述和再现过去事件的同时,历史研究还要对事件发展的结果做出解释,从中揭示规律性的内容,来启发和影响人们未来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历史研究的这种一般特征在规划史研究中同样是适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划史”顾名思义就是对过去的规划实践进行历史学研究,为规划实践的历史过程提供一种有力的解释,并且帮助我们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应对新的挑战。我国的城市规划史研究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历程,也形成一些研究的习惯。古代城市规划史多是采取文献考据、考古学研究和现场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而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可以依赖相对丰富的城市档案和健在的当事人提供的历史信息,因此有条件深入到更细微的时间断面上还原历史事件。不过,观察现阶段我国近现

作者简介

张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of planning history, so as to make the research on planning history more valuable and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planning history;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urban planning; theory; practice

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状况, 我们却发现不少研究并没有将规划历史过程或特定事件的内在因果关系的解释作为重点, 而较多分析某类城市或特定城市的规划历史演进分期, 结合我国近现代历史学分期的概念, 把描述其阶段特征作为成果的重心, 基本满足于提出概念化的结论。这些研究成果在完成对历史材料的系统梳理之余, 能不能对当代城市规划实践发挥更多的启发作用呢? 如何能够在研究的目标和范围上使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同越来越多的近现代城市史、长期的城市建设史研究有所区分呢? 随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的成立, 我们认为已经到了一个总结研究成果和经验, 确立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目的, 理清研究方法和方向的时候。本文试着就此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希望抛砖引玉。

1 我国规划史研究发生的两个特点

在我国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学科发展的背景条件下, 规划史研究注定有着比较特殊的演进过程和研究传统。解放之初, 同济大学的金经昌、冯纪忠等教授在建筑系内创办了我国首个培养城市规划高级专业人才“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 1956 年正式定名为“城市规划专业”。直到 2011 年 3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颁布城乡规划学设为一级学科之前, 城市规划一直作为建筑学下属的专业。有关规划史的研究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我国早期的城市规划史研究大多分散在建筑史研究的成果中; 二是在专业术语上并不强调专门的规划史, 而比较笼统地命名为“城市建设史”。其原因可能和早期将规划专业叫做“城市建设与经营”有关。此外取“城市建设”之名, 可能是为了使历史研究所涉及的主题比专门的规划史做起来要更加地开阔。

我国技术史中的建筑部分开始于 1930 年代, 主要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宿白, 2009)。1959 年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召集全国建筑“三史”编辑会议,

拟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在1964年7月梁思成先生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中^②,梁先生总结道,“在这漫长的但一脉相承、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传统建筑形成了一些最突出的特征”。在他归纳的中国传统建筑九个特点中,第8个特点是“有规划的城市”(梁思成,2001)。显然,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历史话题是在建筑学学科的框架中表述的。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史学研究一直以来是古代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原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工作的贺业钺先生,1982年完成了《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贺业钺,1985),这部著作原取名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研究》,除了深度研究西周之初的城邑建设体制、规划制度、乃至规划方法外,还结合史料研究了从周代到清朝的古代营国制度的变迁过程。贺先生生前最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巨著(贺业钺,1996)。另外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傅熹年院士1990年代完成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傅熹年,2001),这个研究从“模数”入手,把古代建筑的设计规律和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规律做了从微观到宏观的整体揭示。

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1988年春在武汉召开的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上,筹划编撰中国近代建筑史(1840~1949)。建筑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文建筑史,“把建筑的发展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来考察”;二是建筑风格演变史;三是建筑技术发展史(杨秉德,1993)。这部史书涉及的每座城市都从城市近代发展的沿革说起,实质上探讨了建筑发展脉络与城市近代化过程的关系,最后的成果定名为《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1840~1949)》。在每个章节中,都简明地整理了对应城市的建设和规划的历史。在伍江博士编著的《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中用了超过40%的篇幅研究上海城市市政近代化的过程和都市计划的编制(伍江,1997)。显然,在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特殊背景条件下,把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历史研究看作建筑学学科的一种传统领域是自然而然的。

我国的城市规划史研究能够脱胎于建筑史研究,除了有城市规划学科逐步独立发展壮大的原因,更要归功于城市建设史长期的研究积累。正是在上文提到的全国建筑“三史”编辑工作为我国城市建设史研究创造了机遇。据中国城市建设史奠基人董鉴泓教授回忆,“对中国城建史较系统的研究,是从1961年参加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在北京召开的‘三史’编委会后分工编写《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开始的。后连续数年间与阮仪三利用暑假调查测绘了河南、陕西、河北、山西、四川、贵州数十个古城并于1964年完成了校内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史》教材”……“‘文革’后随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对近代的建筑史、城建史才开始采取较为客观及科学的态度。由于汪坦先生倡导,多次举行学术会议,已取得相当的成果”(董鉴泓,2000)。董先生提到的这本《中国城市建设史》历经多次增补,1982年正式出版,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史研究最经典的著作,总结了我国古代、近代、现代城市建设的成就,从城市建设发展历史的分期、城市类型的划分和典型城市的研究等方面系统地涉及各个历史时期规划的主要特点,为我国后来的规划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与我国的城市规划史发生过程不同,西方规划领域早期的对过去的规划实践开展研究出现在19世

纪后期。最为著名的文献就是卡米诺·西特 (Camillo Sitte) 的《城市建设：依照艺术的原则》(*Der Städtebau Nach Seinen Künstlerischen Grundsätzen*) 一书。19 世纪后半叶维也纳建成环城大道 (Ringstrasse)，对环城大道风格的强烈反对催生了西特对中世纪城市空间形态的历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现代城市生活和形式的理念 (卡尔·休克斯, 2007)。沙里宁曾评价西特“借鉴历史指出用现代方法解决现代问题的必要”。从 1898 年霍华德《田园城市》问世以来，现代城市规划领域中的许多著作具有规划史研究的意义。例如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出现过不少规划历史的著作，为霍华德、伯特纳一类英雄般的规划先驱立传 (MacFadyen, 1933; Moore, 1921)，其理念是神话规划的“过去”，弘扬当代的理想主义^③。1950 年代威廉·阿什沃斯 (William Ashworth) 《英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19 世纪与 20 世纪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一书被认为有突破性的贡献，就在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来研究规划事件，但是主导的话语是将规划视作一种模棱两可的、仁爱的、静态的行动 (Freestone, 2000)。

到了 1970 年代，在西方规划理论界主张从物质性规划转型到社会经济规划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城市规划史研究者以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宣示了以规划过程研究为核心的规划史研究的目标。“尽管可以说规划历史总是规划活动的一部分，但对于近现代城市规划的自觉的历史学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最后 25 年……，它关注规划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设计艺术的相互联系” (Freestone, 2000)。1974 年规划历史小组 (Planning History Group) 在英国成立，1986 年美洲城市与区域规划史学会 (Society for American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History, SACRPH) 成立，1993 年国际规划历史学会 (International Planning History Society, IPHS) 成立。国际规划历史学会初期有自己的会刊《规划历史》(*Planning History*)，大约到 2004 年停办，并将 1986 年创刊的《规划透视》(*Planning Perspectives*) 视为自己的会刊，这或许可以看作国际规划历史研究资源的一次重要整合。从几部代表性著作和期刊论文看到 (Cherry, 1972, 1988; Sutcliffe, 1980, 1981; Freestone, 2000; Larkham, 2011)，这个研究共同体的研究兴趣在于描述和解释工业革命后欧美城市 (后来开始关注他们的殖民地城市) 的规划事件和发展进程^④，国际规划历史学会网站上引用了创始人戈登·彻丽 (Gordon Cherry) 教授的名言：“规划史的解释功能，开启了探寻规划过程的丰富领域……规划史将我们带入专业和学术的心脏地带，在意想不到的路途上充满了奇幻和巧合，在那里规划被视为一个过程”。虽然规划史研究是多学科合作、边界有些模糊的领域，但“规划过程”内在规律的探寻成为新时期规划史研究的理论奠基石。请大家了解和重视这一点，这正是我们不厌其烦地回顾西方规划历史研究历程的主要目的。

对我国规划界而言，关注和参与国际规划历史研究活动可能始于 1990 年代初^⑤，那时我们的动机并不止于研究西方规划历史本身，而是把西方规划实践的历史研究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思考和创新当代中国城市规划的基础理论。规划史研究成为规划理论实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张兵, 1994; 孙施文, 1995)。所获得的规划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了我们对于西方城市和规划发展过程的认识，在反思我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建设方面的确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与此同时，人文科学界的近代城市史研究 (张仲礼, 1990; 皮明床, 1993; 罗澍伟, 1993) 扩展了我们观察规划过去的视野，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专

注于我国近现代规划历史的研究(朱自煊, 1989; 李百浩, 1994; 曹洪涛、刘金声, 1998; 周干峙, 2010; 吴之凌、汪颢, 2009; 李百浩、郭建、黄亚平, 2006a; 等等), 其中李百浩教授的团队围绕近代城市规划史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研究新中国城市规划历史方面, 199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是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一项系统的史料整理, 有众多学者参与其中; 后来也有学者自发研究, 完成了不少成果(汪德华, 1990, 2005; 李百浩、彭秀涛、黄立, 2006b); 值得赞许的是城市规划学会及其地方学会组织研究发表了一批成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999; 汤士安, 1995); 最新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成果是邹德慈院士领衔研究完成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史(1949~2009)》。同时, 国内学者对于西方规划史研究动态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曹康、顾朝林, 2005; 曹康、黄晶, 2009; 曹康, 2005; 李百浩、罗文静、黄立, 2011)。从我国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看, 进入21世纪, 我国城市规划史研究成为规划学术界的共同诉求。经过多年酝酿, 2012年11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 凝聚了一批关注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规划工作者, 希望在我国规划史研究和规划理论研究方面“汲取历史智慧, 求同存异, 确立当代城市规划的‘根’、‘源’和‘魂’”^⑥。诚然, 对规划历史和理论研究的任务的诗意表达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对过去一个历史阶段我国规划史研究状况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在研究方向的确定、领域的选择和界定、研究方法的采用等问题上进行广泛讨论, 以有利于在恰当的方向上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

2 城市史、城市建设史与城市规划史

城市史是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过程和现象来研究的, 似乎无所不包, 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关注作为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的社会生活, 关注城市的区域功能、经济与产业、人口和社会结构、社区与家庭, 以及市政管理等等。在许多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存有大量城市发展历史规律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 2003; 韦伯, 2004; 布罗代尔, 1993), 可以视为城市史的经典之作, 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城市史研究最核心的方法和概念基础。

相比之下, 城市建设是一个非常广阔但又比较具体的领域。“城市建设史”可以理解为涉及城市建设的一整套技术的发展史, 这是具体的一面; 也可以理解为关于城市发展的历史, 在硬的工程技术之外, 还有一部分与城市演变直接关联的社会、经济和区域的历史, 这是开阔的一面。和我们读到的一些城市史文献相比, 城市建设史更多地是在社会经济背景的认识下偏向区域、人口、规划、市政、交通、建筑等方面发展演化规律的研究。

如何来理解城市规划史的含义呢? 这取决于如何来理解“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已经远远跨出了原建筑学的学科范围(赵万民、李和平, 2012), 从物质形态范畴为主体扩展到更广阔的城乡社会和经济范畴(吴志强, 2011)。作为具有独立性的一门学科, 我们可以将城市规划的知识体系视为一个历史的整体。城市规划史将不仅包括城市规划职业技术活动的历史, 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发展演变

的历史,而且还注定包括城市规划方法论的历史,换个角度讲,城市规划方法论的研究如果缺少了历史的维度,这样的研究是无法开展下去的。规划理论研究自然也离不开理论演化历史的归纳和总结,反之,规划历史的研究必然是以规划学科理论作为认识基础的。上文提到近40年来国际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正是在西方规划理论转型的条件下发生的,而且其研究的意图不是规划历史本身,而是换了一个历史的路径,研究西方规划运动同社会经济过程内在关联的规律性,以发展规划的理论(Sutcliffe, 1999)。在我们思考我国规划史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时,这个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总之,城市规划史是城市规划学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规划史研究是规划“理论实践”的重要内容。如果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建立未果,那么在城市规划史研究者那里试图建构独立的规划史学科体系的可能性是不存在,而且是没有必要的。

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层面上,我们继续来研究从城市建设史到城市规划史的差别究竟在哪里?用手头《近代东北城市建设史》一书(吴晓松, 1999)作为样本,来看看城市建设史的一般研究框架和路径。研究者首先对近代东北城市发展进行系统的分期。他将东北城市建设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从明末到1858年的城镇萌芽期;二是从咸丰八年(1858年)中俄《璦琿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为起点,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建成和日俄战争爆发(1904年),作为东北城镇形成期;三是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正约》开辟16城镇为商埠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作为东北城市逐步演变、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时期。在每个历史分期中,又按照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做进一步的阶段细分。然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对东北城市进行分类,特别针对近代东北城市的功能划分为政治军事城堡、通商口岸城市、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行政中心等七个类型,并通过典型城市案例的整理来深化特征认识。在案例城市的研究中,研究者吸收了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试图对城市的演化变迁同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变化过程联系起来,并且用城市形态学的方法研究特殊时期自然地理条件和规划对城市形态变化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划史研究的痕迹,但是基本停留在规划史料的梳理和概念化的特征描述,对于规划形成的过程以及对城市建设产生影响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太多的涉及。研究者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交通技术、军事侵略、外来文化等角度试图总结东北城市建设的规律性特征,但对于规划活动规律的概括并没有当作研究的重点。

我们注意到,这个城市建设史的研究框架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最近十年发表的许多规划史研究的文献中清晰可见。通过分类、分期和空间上分层、分区的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网罗各种类型的城市,试图解决宏观的通史叙述和微观的案例(局部地区)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关系,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中一般性的规律和特征性的认知在这个方法框架中也可以有一个全面的、平衡的照顾。

在过往的城市建设史研究成果中,规划史的内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仅从横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上判断,我们无法分辨城市建设史和城市规划史的差别。规划史的边界有相当部分与城市建设史的边界是重叠和交叉的,但是规划史研究中却有相当的部分无法被城市建设史所覆盖,这就

是规划史研究的特殊性所在。而这种特殊性源于对“城市规划实践”理论研究规定性的理解。国际规划历史学会奠基人之一的戈登·彻丽(Gordon Cherry)在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城市社会形成历史后,对自己的规划史研究做出这样的表述,“这是在规划史领域中的尝试。尽管(规划史研究)用了它们的方法,但它(规划史)既不是城市史,也不是艺术史,也不是历史地理,或者政治史,也不是公共政策史。这是过去200年国家为城市生活条件制定标准、制定规划、采取步骤并通过一天天的控制与引导来决定或影响城市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①。换言之,规划史就是规划史,就是研究规划实践过程的历史,研究规划干预和塑造城市环境的历史。

关于规划实践的理解决定性地影响了对规划史研究重点的理解。“历史研究,特别是那些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所要进行的研究,都必须力求做出含有理论成分的记叙。如果不与某一种理论联系起来,作为某一门特定的学科中对于某一特定研究问题的所有回答的集合的记叙是不可想象的”(Topolski, 1976)。因此,对于规划史研究来说,它对事件的描述和记叙必须同规划理论联系起来,必须同规划实践过程的研究任务联系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城市建设史则没有这个必要和可能,因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城市建设”是不存在的。

在我国当前和今后,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快速城镇化的社会需要。而作为规划学科的一个分支,推进规划史研究势在必行。在城市建设史长期的积累基础上,规划史研究需要从城市建设史的成果深入充分地汲取养分,有意识地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搭建研究的平台,厘清概念,尽快使规划史研究朝着丰富规划理论认识、改善规划实践的方向进步。

3 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任务和方向

规划史研究者不应只是满足于单纯的知识生产。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规划历史?我们的研究要给社会带来什么?我们要就规划历史事件进行记叙和解释的工作目标是什么?规划历史研究结论对规划理论的建设发展会有什么帮助?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对于我国现阶段规划史研究者来说不是多余的。

我认为研究规划史的任务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通过整理过去的规划实践,发现规划实践活动的事实,总结规划过程中规律性的内容,丰富和发展规划理论。“时间给予我们一系列知识,如果我们的眼界够宽阔,我们的分析够透彻的话,就能揭示‘事件’背后的‘结构’和‘事态’”(R. Floud, 1985)。这种揭示只有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规划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才能做出,反过来历史研究对这些方法的未来发展又具备重要的意义。二是满足规划工作者认识规划职业自身的要求,反观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着的规划师的角色和作用,探究这种变化背后特定的文化意义;三是发挥历史研究成果的教育功能。在我国全面进入城市社会的关键时期,规划历史的教育和其他类型的历史教育一样,是形成社会意识的重要基础。这种意识涉及社会成员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认识,对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认识,对正确的规划价值的认识。无论城市发展的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作为城市社会的一员,接受起码的规划历史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②。

在实际生活中,规划师怀抱着“理想城市的理论”,总是试图启发和影响决策者,但往往事与愿违,压力之下规划只好妥协,甚至完全按照决策者的意图来更换方案。规划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因为坚信规划让城市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无论城市规划工作遭受到何种困难、何种阻力,事实上从历史角度纵向观察,中国城市居民今天的生活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如果同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相比更是翻天覆地^⑥。城市规划在这个复杂曲折的社会经济历史过程中有着自己的贡献。如果没有规划,中国的城市发展到今天会是怎样一幅杂乱无章的情景?对这种社会进步背后的规划力量给予科学的、历史的分析研究,解释内在的因果关系,一定会有助于说明规划的社会价值,当然我们也可以褒贬规划的得失,无论对社会正确意识的建立还是对规划自身的完善都将很有意义。规划历史研究者应当努力肩负这个责任。

要胜任这项工作,规划历史研究者就要和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一样,研究过去的社会,并且是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整体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应当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在这个理论实践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自觉地建立和形成我国规划史的研究传统。

规划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一般规划档案的梳理和堆砌,不应止于历史阶段特征的简单归纳。静止地观察每个历史阶段的规划特征,往往是从规划图档的研究入手,分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背景也往往是概念化的,用时间的线条把简化的“阶段特征”硬穿着一起,忽略了丰富生动的规划实践的历程,强制性地“提炼”出一些教条的东西,这种规划史的研究成果很难看出对当代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启发价值。董鉴泓先生在讨论古代规划史研究方法就指出,“有一些研究仅依靠一些文献,其结果并不可信。……仅依据十分间接的一鳞半爪,加以个人的解释和发挥,而侈谈古代城市规划史及规划理论,易入误区”(董鉴泓,2000)。当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规划文献档案收集的困难。即便是近现代规划史的研究,真正开展规划过程的研究时会发现很多参与其中的历史见证者已经过世或者因为年迈记忆不清,当时当地城市决策背景和细节的记录留存不足,获取的文献档案常常呈现碎片化的现象,使研究者无法进入“规划过程”的分析探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规划史研究者共同探讨。

此外,目前我国规划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清晰的问题,在分散的主题和方法的不同认识条件下,规划史研究者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围绕方法论问题开展集中的讨论。我们希望取得共识,能够在规划史研究集体中逐步地、自觉地建立起我国规划史的研究传统。在这个方面,我们或许可以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经验中受到启发。被称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特征之一”(常建华,2008)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之中,主张“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陈春声,2006)。”他们针对本领域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给出毫不留情的批评:“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用便于记忆但差不多可到处适用的若干文字符号来表述一个地区的所谓特点,再根据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构想出来的分类方式,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断粘贴上去。这

样的做法再泛滥下去,将会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继续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陈春声,2006)。要研究区域社会发展内在的脉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走向田野”,认为“要从一个个小村子、一个个具体的地方中讲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对话,才能够对别人的研究有所启发”(常建华,2008)。而这些观点反映了社会史学界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方向,很值得规划史研究者借鉴。可喜的是,最近城市规划教授王鲁民博士的新作《建构丽江——秩序·形态·方法》中,耐心叙述了丽江空间形态和景观建构背后的历史因果关系,在方法上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规律的认知,可算是规划史研究者一次有意义的突破(王鲁民、吕诗佳,2013)。

我们希望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能够对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完善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1999年萨特利夫(Sutcliffe)教授——“规划历史小组”(Planning History Group, 1974)的另外一位奠基人——在总结规划历史研究25年历程时指出,“规划史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以自持的领域……但是遗憾的是,1974年开始我主张历史研究能够对规划理论和实践有所贡献。但25年过去了,还看不出有所落实”(Sutcliffe, 1999)。这其中究竟是何种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之际,所有规划工作者特别是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爱好者都应当静下心来,借鉴国际规划历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一起认真考虑我国规划历史研究的正确的方向和恰当的方法。

注释

-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蔡元培道,“历史者,记载以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高平叔编,《蔡元培史学论集》)。
- ② 在《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第448页脚注中注明六稿绪论写于1964年7月。林洙在为重印梁思成1942年《中国建筑史》所写的后记中则提到,1960~1962年先后完成了六稿。据此,六稿绪论可能写于1962年。1964年完成修改后的第八稿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 ③ MacFadyen, D., 1933, Sir Ebenezer Howard and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oore, C., 1921, Daniel H. Burnham: Architect, Planner of Cities, Houghton Mifflin. 转引自 Freestone, 2000, Learning from Planning's Histories, in *Urban Planning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perience*, London: E & FN Spon, 1-16。
- ④ 戈登·彻丽将自己研究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城市规划史的目的解释为两个方面:“一是建构一个提纲性的背景,描述和解释两个世纪来的事件和发展。连续的线索是在社会变化的背景下理解城市事务中的公共干预的特性,特别是从城市环境的观点。从这个方面讲,我们研究英国工业城市中的设计、空间结构以及城市人工物品和空间。这个背景是社会的经济的变化、政治和制度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创新过程。通过这个背景全面的、连续的编织就可以提供对发生变化的解释能力。第二个目标是我们可以绘制出过去150年从国家干预城市事务视角的一系列事件。当然,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定选择性。无论这些过程的起源如何,我们检视的不仅仅只是变化的过程,而一定程度上是研究国家(State: 地方、中央政府以及公共部门)如何采取措施,介入对环境的管治,支持国家或者社区的利益,而约束那些私人的、或者不动产和商务的利益。当然国家行动的意义得在一定背景

下才能理解,重点对为什么、采取何种目标,国家采取何种后续措施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和在哪里生活,我们的城市应当有什么形象以及城市发挥怎样的社会经济作用”。引自 *Cities and Plans: The shaping of urban Britain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988, pp. 180-181。

- ⑤ 1992 年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来自日本的渡边俊一 (Shun-ichi Watanabe) 教授。他著有规划史专著《“都市计划”的诞生——国际比较下的日本现代都市计划》。在他的介绍下我和戈登·彻丽教授建立了联系,他帮助我了解了许多英国规划历史的细节。1994 年我加入国际规划历史学会。在当年总共 315 名会员中,我是唯一一位中国人。当时英国籍会员 99 位,美国 68 位,日本 58 位,澳大利亚 14 位,加拿大 12 位。人数排在前位的五个国家会员数之和占到总数的 80%。

1994 年 6 月 IPHS 第六届年会在香港大学举办时,浦东开发刚刚全面铺开,我写了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nning for Urban Spatial Strategy in Shanghai (1927-1949)*, 我的发言稿被录用。后来导师李德华教授帮助我修改我的英文,香港大学历史系对上海历史很有研究的 IPHS 会员 MacPherson 博士也给我很多帮助,最后这篇短文发表在 *Planning History* 会刊上 (1995, Vol. 17, No. 2)。那次年会因为做学生的我缺少路费,最后也没有成行。到 2008 年 7 月在芝加哥举办的第 13 届 IPHS 年会,我又因抗震救灾工作紧急,缩短在美国的行程,只是投稿但没有到会发言。

- ⑥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成立,发出《关于推进我国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出:“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我们倡议城市规划界要积极挖掘国内外丰富的城市规划史,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域以及不同历史人物的城市规划实践、思想、著述、史迹等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汲取历史智慧,求同存异,确立当代城市规划的‘根’、‘源’和‘魂’。”

- ⑦ 引自 Cherry, G., 1988, *Cities and Plans: The Shaping of Urban Britain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Y: Edward Arnold, p. 181。

- ⑧ 城市社会的最终建成有赖于市民意识的形成,而市民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对城市的正确理解。规划历史的教育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了解规划的作用,了解没有规划的后果。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关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误解。这表明,规划历史的教育不是多了,而是奇缺。我不久前曾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个某地级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动员大会上,一位曾经分管过城市规划工作的市领导慷慨陈词,质疑自己的城市要编什么总体规划?他说,“我到了新疆石河子一看,哪里编过什么规划,就靠几个当兵的不也能把一座城市建得井井有条吗?”当然在 21 世纪耳闻这样的观点是比较稀罕的。但此事说明,如果这位领导到了石河子不是走马观花,愿意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多做一些深入了解,或者有一位懂行的规划师作为向导,或者这座城市在兵团建设成就展览中充分介绍兵团前辈重视规划的经验,那么就不至于使这位领导如此自以为是。事实是,在王震司令员选定石河子作为开发北疆玛纳斯河流域万古荒原的指挥中心开始,1950 年至 1958 年先后有二十二兵团勘测队,赵深、刘光华教授主持的上海联合顾问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新疆军区工程处,中央联合选厂组,新疆建筑勘测设计院等五个单位六次提出七个总体规划方案(邵庄法:“石河子市的城市规划及其特点”,《城市规划》,1984 年第 1 期)。

- ⑨ Harvey (1996) 在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一书中指出,各大洲的人类都意识到 20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相比,生活的环境大为改善,更进一步讲,这个结果有赖于许多好的干预,有赖于许多城市改革的远见卓识,有赖于更好的配置资源和解决冲突的过程。转引自 Freestone, 2000, *Learning from Planning's His-*